

鲁迅印象记*

王志之



* 本书据上海金汤书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第一版排印，删去原书附录部分。王志之(一九〇五~一九九〇)，笔名含沙、楚囚，又化名思远。四川眉山人。一九三二年为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文学杂志》月刊编者之一。同年十一月鲁迅回北平探望母亲，他受北平“左联”之托与鲁迅联系，并请鲁迅到北师大讲演(《再论“第三种人”》)。所作短篇小说集《落花集》鲁迅曾为之校订。回忆专著《鲁迅印象记》(初版署名含沙)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版后，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我的想法

鲁迅先生死了！他就这样突然抛弃了他那锐利的武器，停止了他的步伐，同我们永别了！前些时候，人们还抱着满腔的欢欣传说他的病好了，怎么想得到？他突然死了！

在无法抑制的感情激荡中每每善于自己灌自己的米汤以求精神上的解脱，尤其是文人，更会利用一种突然的变动使出各色各样的花枪来显示自己的本领。譬如鲁迅先生现在死了，有的人一定要咬紧牙关说他没有死，有的人则说是太阳熄灭了，巨星陨落了，甚而至于前几天还在同他一枪一刀地厮杀，现在也突然摆出一副哭丧脸，表示他也有些“那个”的样儿，要是再过一些时候，我相信，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会在他的遗言上来寻章摘句作为自己的盾牌了。这，鲁迅先生是明白的。他说：

一个伟人在生前总多挫折，处处遭人反对；但一到死后，就无不神通广大，受人欢迎。佛说一声“唵”，弟子皆有所悟，而所悟无不异。（《伟人的化石》）

不管是怎么说法，实际上鲁迅先生是死掉了，这不是谣言，也不是做梦，他的精神尽管在人间永远遗留着，我们此后再也听不到他对于这千奇百怪的社会发出那样辛辣的讽刺了！他不是太阳，也不是什么巨星，是一般大众最敬爱的文学的导师；现在我不愿意而且也不可能在这儿来研究这位伟大的文学者的思想立场等等，我只知道，无论是什么思

想，站在什么立场，鲁迅先生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所站的独特的地位恐怕不会有人否认了吧？所以，无疑地，鲁迅先生的死，不管你怎么说，是整个近代中国文学运动最大的不可挽救的损失！

在这儿，我能够用什么言辞来表达出自己的哀悼呢？对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惟一的文学之父一生的劳绩，自有其灿烂的光辉照耀着千万人的心，我想，一定还有多多少少的人比我认识得清楚，透彻。我现在只想说出个人对于他生前的印象和死后的感想，只想把郁积在内心里的一切悲愤吐出来，然而被这消息所激起的感情无法平静下去，突然涌在心头的那样多的话怎么说呢？

我不愿意来计算这位伟大的文学者在创作上给我们有多少宝贵的模型和启蒙的教训，我知道自己的能力也不容许这样做；我相信，人们同情他，敬爱他，并不仅仅由于他在新文学的建设上有巨大的劳绩，而是因为他有青年人百折不挠的精神，有纯真的爽快的性格。他是一个极顽强的战士，无论你戴着怎样的假面具上场来，总滑不过他那锐利的眼光，有多少人，一触着他那辛辣的讽刺立刻就原形毕露。他是彻头彻尾的旧社会的叛徒，他是那些“正人君子”、“名流学者”们的死对头；从“五四”以前到现在，他无时无刻不在战斗中，也无时无刻不在戳穿黑暗的牢笼向着光明前进。数十年来，同他一道 的战士，多少人站住了，多少人脱逃了，甚而至于还有多少人掉戈相向，倒在敌人的怀抱里去了，他却一步步地踏上了更新的境地，在他的周围的差不多又是新起的战士！他有这样坚强的性格，无论你是怎样凶恶地巧妙地施展出来的明枪暗箭，他都是勇往直前毫不屈服的。即使是对自己的病，近年来，他经常在病痛中，从他每次的来信，从人们的传说，我们为他的身体涌起了无限的忧虑；然而，他自己却并不在意，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体，他的眼光只对着当前的敌人，他并不为自己的身体遭到创伤而耽心着死，只想到生命的短促而要加紧向黑暗猛攻，同不合理的社会战斗；他认定：“死是人生自然的法则”，他只是“在不知不觉中，记起了自己的年龄”而“要赶快做”！他现在这样赶快地把自己的生命结束了，竟把全中国甚至于全世界最可宝贵的这一生命结束了！他赶快做出来的事情当得起这样大的损失吗？不！一千个不！一万个不！我们对于他的死感到了无限的惨痛，同时，更耽心着他死以后将要怎样才能够继续来完成

他的伟业呢？现在，有谁能够负担起他放下的责任呢？没有！实在连影子也没有！

同在这一年中，我们失掉了两个最伟大的文学导师——高尔基和鲁迅。但高尔基是死在苏联的宪法公布以后，鲁迅则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殉难了！说他“殉难”，我认为没有错的，在这儿，我们可以引出他的令弟京兆布衣周作人先生的话来作证明：

说起他的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却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要生气，静养更是没有那回事。所以病就一天天地加重起来，不料到了今天，已经不能挽救。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初可以说受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譬如我们看他的《阿 Q 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然深刻极了，可是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

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家母几次让他到北平来，但他总不肯，他认为上海的地方是很适宜的，不愿意再到旁的地方去。（十月二十三日南京《新民报：北平通讯》）

不错，我们的鲁迅先生，“动不动就生气”，不能像他的令弟苦雨斋居士那样悠闲地穿起袈裟（究竟真的穿上与否，我们却未曾见到过）躲在“寒斋”里玩古董，学画蛇，也没有同现实脱离过，始终在这漆黑一团的社会里冲，所以同人家冲突的那些“小事”也就在所难免了。就连同他的令弟周作人先生都要“冲突起来”，别人看到的“小事”甚至有人还认为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都可以使他激动起来。这，我们不能怪他“个性偏偏很强”，即如他同周作人先生，从来就不相往来，我们能够只在感情上来认为这只是“弟兄不和”时的一点“小事”吗？记得去年我要给他

介绍一位周作人先生的门生通信，并请他介绍投稿，结果回信来拒绝了：

《译文》我担任投稿每期数千字，但别人的稿子，我希望直接寄去，因为我既事烦，照顾不转，而编辑好像不大愿意间接介绍，所以我所介绍者，一向是碰钉子居多。和龚君通信，我希望从缓，我并无株连门生之心，但一通信而为老师所知，我即有从中作祟之嫌疑，而且又大有人因此兴波作浪，非常麻烦。为耳根清静计，我一向是极谨慎的。

“多疑”，“个性很强”，这是周作人先生认定的他老兄的缺点，但在另一方面却又为许许多多的人极口称颂了。他把这社会看得十分清楚，他看透了許多凶恶的卑鄙的面孔，所以他“一向是极谨慎的”。在这人世上，竟有开头摆出凶恶的面孔来同你战斗，要是你能够稍一持久，渐渐地会使对方显出笑容来，甚至有的在一面战斗，一面却在笑着向你招手。如像我们那位“友邦”的“亲善提携”就是现成的例子。鲁迅先生看得清，他只是很固执地一往直前地走他自己的路，他是这样“多疑”的，他的“个性”这样就“很强”了。就因为他的性格有这样的特点，使他愈不能容于旧的社会，这样使他对于旧社会更加坚强其憎恶的心理，于是他就一步不停地前进了。

在这种情形下，他再也无法顾及到自己的身体，竟在这样污浊的黑暗的社会下捐弃了他的一生。我们知道，高尔基本来也是有肺结核症的，我们的鲁迅却没有像高尔基一样的幸运得到意大利去休养；他的死，我感到比对于高尔基还要更加惨痛，我们的损失，实在比苏联还要大得多啊！

也许有人认为鲁迅在文学上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成果不及高尔基那样伟大，然而，我们不要忽略了中国的社会是在怎样复杂的破碎不堪的境况中变动着，我们的文学运动是跟随在如何短促的忽倏的历史阶梯上飞跃着。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了鲁迅这样伟大的人物已经足够在世界文坛上炫耀了；假如没有他，则不但“五四”的新文学运动只留下一页白纸，我们的进行怕不免还要走更多弯曲的路径吧！

在这儿，只想说我个人对于鲁迅先生的印象，就作为我自己向他敬致的一篇悼词；我不愿而且也不能涉及那些大问题，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就连要想叙述自己的一点儿感想都恐怕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不能有条不紊地吐出来，在高度的感情激荡中，我更无暇在构思和措词上用力了。

片断的回忆

自去年底离开北平，差不多一年没有接到过他的信。这当中，因为生活关系，不得不暂时压住自己的感情，同他隔绝了。那天早上，正在给一个朋友写信，接着送来的报翻开第一版就蓦然触到了那样骇人的几个大字：“鲁迅昨晨逝世”。我的心头一跳，两眼也昏花了。我没有心绪细细地看那些详细的记载，对着那幅“鲁迅遗容”禁不住一股热情涌了上来。当时只想扔掉一切往上海跑，只想去望他最后一眼来补偿这永久忘不掉的遗恨；一会儿，又想提起笔来写，想在纸上把这一年来压住的感情同这消息所激起的惨痛发挥出来，但结果却只是在心头跳跳，伏在桌案上几个钟头说不出一句话来！我这人素来就有这样一种古怪的性格，我最讨厌哭泣，然而在这儿我实在顾忌不到别人的骂而写出自己忍不住流泪了。我们纵然抛开那些大问题不谈，只想到自己一生的遭遇，我的父亲从没有那样关心过我，我的师长没有给过我那样好的教训，我的多年的旧友在我生活困厄的时候个个都躲开了，没有一个人像那样不嫌麻烦地给我许许多多的帮助。忍受了这将近一年的时间想到将来总可以同他通信或是见面，现在一切都绝望了！我知道自己是异常的渺小，从这里我想到鲁迅先生对于一般的青年是如何地在热心帮助，我现在突然丧失这样伟大的导师，世间恐怕不再有这样热烈的友情，我耽心着自己将茫然失措而无所适从了！

奇怪的是在几天前因为搬家在那些信堆里清出了一部分鲁迅先生的信，在那时我就特别提起了自己的注意把它们保存起来（离开北平时曾经扯掉了些）。现在想到仿佛在无意间已经在心里潜伏着不祥的预

兆，其实，再进一步思索，到并不是什么“预兆”，这是因为在长久的隔绝后更感到那些信的可贵，当时的心理大概不过如此而已。假如要说“预兆”，鲁迅先生近来的文章也常常提到了死，仿佛他也预感到了什么似的，其实是久病中“记起了自己的年龄”，而耽心着他所努力要做的事情。这并不是他的预感，这是他给我们遗留的警语，这是他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纪念品啊！

我还想在那一大堆纸屑里发现一些最宝贵的纪念品，结果只找出了几个空信封（里面的信笺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扯掉了），以及我数年前的一些讲演稿；鲁迅先生在北平遗留给我们的那几幅照片也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我翻开那一叠讲演稿，有一篇是十九年在四川重庆法专讲的《文学与社会》，开头就曾涉及到鲁迅先生：

比较进步一点的也不过是过渡时期的代表，即周作人先生所谓“骑墙派”的人物是也。他们在旧社会中固然感着种种的不满，在革命的环境中也处处都看不惯，他们对于一切现象不满足，只是个人的心里感着厌烦，因为胆小而又没有反抗的勇气，这种人，满肚子充满了自尊的虚荣之气，对于人生是处于客观的地位，既恐怕旧社会伤害了他，又恐怕跟不上新社会，所以不能不跳出社会，钻入“象牙之塔”嗟叹，社会上熙熙攘攘的人众，在他的眼光里只是些小动物在蠢动！所以不能不慨叹：“都是混闹，而已而已！”

这种人物，可以鲁迅先生为代表。他老人家，封建时代的种种黑幕是亲眼看到的，并且能记得清清楚楚；阿 Q 的精神战胜法，确是中国数十年前农民的写真；但是，现在的情形怎样？阿 Q 那样的人物固然不能说没有，但是一般的农民已经有了自觉心，有了有组织的反抗精神，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来已经有了不少的事实证明。鲁迅先生对于数十年前的情形看得明白，记得清楚，对于现在就蒙眬起来了。至于将来是怎样，一个时代，他老人家更莫名其妙！所以阿 Q 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还在那里追忆过去而呐喊；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他还在那里“醉眼蒙眬”彷徨而已！

鲁迅先生在文艺的技巧上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有相当的成功，只可惜他把握不住时代，不是的，他把握的时代已经老早过去了！

他说：“上海的文学界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吧，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他觉得只要是工人就行了，要是工人才有这种“意识形态”；他把文艺运动的自然转认为有意“恭迎”的把戏了！

所以鲁迅先生终于是彷徨，终于是呐喊了！（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重庆《新蜀报》）

在一九三一年前我对于鲁迅先生就是这样认识的。那时的一般青年对于将来都抱着一种狂热的过分乐观的憧憬，鲁迅先生在他开始踏上历史的另一阶梯前已经察觉到当时站在尖端掉头过来向他百般嘲笑的那些人物差不多尽是高擎着骗人的幌子，有的人则是为了自我的打算抱着种种的幻想在那里唱高调专做“获得”群众的工作，记得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到张资平氏的前进：

别人还在萌芽，他就在那儿收获了……他一下掉转方向，拔步飞跑，望尘莫及，鸡犬飞升，……（大意如是）

在左联成立的大会上有这样的讲演：

大家不要以为，现在替无产阶级出力，将来革命成功，他们无产阶级就会请你坐特等车，捧起白兰地来说：

“我们的诗人，你请吧！”假如这样，将来一定会失望的！（大意如是）

从各方面看来，鲁迅先生的“个性”确实“很强”，他为了真理是丝毫也不苟且的，他用他那作家的锐利的眼光看透了虚伪，私心，他是为了要使大众更加明确地认识到真理，所以绝不放松他在开始迈步前的战斗。同时，在战斗中他也并未曾忽略过自己的弱点。在这儿，他的“个性”就不“很强”了，他很能够接受一般青年对他的热望，他很高兴别人对他的善意的正确的批评，他在各方面的打击下加紧社会科学哲学等

理论的研究。于是，人们都说：“鲁迅转变了！”其实，鲁迅的一生何尝走过同时代相反的路径？他的反抗精神始终是一贯的，他随着历史的步调一步一步地前进了！

“个性偏偏很强”的人是不会“转变”的呀！

是的，他在一九三〇年以后更加前进了。经过那一度的战斗，许多假面具被戳破了，一般青年的认识更加清楚了，自己的弱点也在努力中填补起来了。

人们对于鲁迅先生的印象在这儿起了一个剧烈的“转变”。

鲁迅在北平

记得我初次——也可以说是最后——会见鲁迅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天。那时，我刚在津浦路线上的一个师范学校打掉饭碗，被学校当局把行李扣了，从驻军的包围中只身逃回了北平，忙着联络教育界的人物，向教育厅起诉。突然一个特别令人兴奋的消息把整个的心境给转变过来了，师大的同学们都在偷偷地拉着叫：

“听说鲁迅真是到北平来了！”

几天前，报社就露过这样的消息，但，大家的经验，报上对于这位惹人注意的人物经常都有些谣言传出来，虽是有时令你摸不着它的用意所在，总之是难于令人相信的。我却想到他的危险性，耽心着这消息的不确：

“未必吧？他为什么到北平来？”

“说是他母亲病了，他来……”

我不禁发狂地跳起来，拉着一位同学跑去找我们的国文系主任玄同老爹问：

“听说鲁迅来了，钱先生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满腔的热望触着了一片沉默，猛烈的冲动碰在冷酷的崖石上，我望着钱先生的眼眶渐渐地胀圆了，眼珠挺起来死死地把我望，那情形，好像立刻就要一口把我们吞下去。

“我们已经决定，”那位同学不识趣，涨着透红的脸接着说：“我们要请鲁……”

突然，好像炸弹爆裂了，我们的钱主任比在讲台上讲《音韵沿革》还要响亮还要迅速的声调一股气冲出来，头连连地几摆，口水密密地往我

的脸上喷：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

我们不敢再哼气，被烈火燃烧着的心直跳，偷偷地拉了一下，垂头丧气地退走了。

碰了这样一大钉子，我们却并不灰心，乘着一股热望到处去打听，从早晨到下午，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失望，最后，终于知道了我们的鲁迅先生住在宫门口西三条，但门牌的号数却怎么也探听不出来了。

“走吧，”我拉着那位同学说，“我们去挨门挨户地问，总可以问着。”

在路上，听那位同学说，我们的钱主任已经公开宣布出来：“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

想不到事情会弄得这样严重，想不到我们的钱主任为了什么缘故也同我们一样地兴奋，想不到请鲁迅先生来讲演同他的主任当不当有什么关系。想不到也罢，我们顾及不到这么多，我们相信，鲁迅先生来给我们讲演一次，比他当这么多年的主任给我们的益处大得多！

我们先到宫门口的巡警派出所去清查西三条的户口，把所有姓周的住户都记了下来，同时还问那些巡警：

“你知道西三条有一个姓周的刚从上海来吗？”

在胡同口，无论碰着推水车的或是卖零物的，我们都一个也不放松地拉着招呼：

“喂，劳驾……”

进了胡同，敲开那些不识者的门，失望以后也照例地提出相同的问题：

“喂，劳驾……”

说了不知道有多少“劳驾”和“对不起”，打听到了一家姓周的，问起来的情形都同我们知道的很相仿佛，据说是南方人，他家里也有人刚从南方来，等到我们兴致冲冲地按着门牌找到的时候，我们不禁同时惊叫起来了：

“怎么？他的母亲死了？！”

我们望着大门外的砖墙上贴的“恕讣不周”的字条，心头卜卜乱跳起来。

我们在外面敲了半天的门，才听着有人跑了出来，躲在门里气势汹

汹地问：

“干什么的？你找谁？”

我们详细地告诉他，那个大门忽然开了，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走了出来，显得很和蔼地问：

“你们是不是找鲁迅先生？”

我们回答了，他又很热心地伸出手来往东指，很详细地告诉了我们：

“他住在××号，这儿往东去不远就是的。”

“好的！好的！劳驾！劳驾！”

无法表达的欢欣，感激，我们跳下阶梯往东跑，那位青年还不放心，跟着跑了来。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你们叫吧！”

小小的双扇门，我们在门环上敲了几下，里面一个女人答应着出来了。

黄昏中，妈子把名片接过去：

“请等一等，我去看看在家没有？”

但我们怕落空，不由分说，一直跟着冲了进去：

“在家！在家！我们约好的。”

跨进二门，来到了一个正方形的院坝，仓卒中并没有观察到四周的情形；我们刚走到院坝当中，北屋里跑出一位青年来，很和蔼地探听我们的来历，跟着，北屋的门又开了，同时发出了一种声音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

“进来吧！请他们进来！”

昏暗中，我望着一位矮而且瘦的老头子，穿着一件棕黑色的毛线上衣，用短促的南方口音在打招呼。

我的心突然像跳到口腔里来，我想，现在同我们惟一的文学导师会见了。

当时的心理，现在不能细细在这儿分析出来，我只感到意外的喜悦几乎使得自己的一切举动都丧失常度，当我钻进北屋的那道门的时候反而踌躇起来了，我仿佛立刻想到了自己的渺小，不禁茫然失措，局促不前了。在一瞬间能够看得清的是里面是品字形的三间屋，当中的过道上安置着一个火炉。我们停顿在火炉旁，鲁迅先生已经退进了正中

那间小屋。

“进来吧！”

我们被招待在那间小得好像雀笼似的屋里，并坐在靠壁的茶几旁，鲁迅先生背对那盏光线不很强烈的电灯，坐在书案当前的藤椅上，正面对着我们。我被高度的感情震慑住了，当前的一切都很模糊，我只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灰黑色的头发是那样凌乱，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深厚的内涵，我想到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生的经验和宝贵的智慧潜藏在里面！瘦削的脸是那样的憔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颧骨，我不禁在这儿涌起更深的同情和忧虑。他靠在书案上的那支手捏着一支燃起的纸烟，显得很有趣味的眼光把我们这初次来访的青年望着。

妈子把茶送来，跟着，鲁迅先生伸手把桌上那筒美丽牌的纸烟递给我们：

“你们抽烟吧？”

在先我们都好像是因为太兴奋，被燃烧着的感情堵着嘴说不出话来，也许是涌上心头的話太多，一时想不到从何说起。

在这一段空隙中，我才有暇来细心观察屋内的情形；我首先触着的当然是正对面电灯光下的那张书桌，一头靠着玻璃窗，桌面上乱翻翻地摆着纸片和笔墨；我们的左手边全是玻璃窗，被白布挡着了一部分；我望着那些粗糙的家伙，想到了他的令弟京兆布衣周作人先生的“寒斋”，相形之下，这个“雀笼”实在太不雅相了。这“雀笼”里倒也并不“寒”，一股干燥的热气阵地逼来，我忍不住赶快把大氅脱下来，同时为我们的老头子那么衰弱的身体涌起更大的隐忧。

“郭沫若发表那篇《眼中钉》，周先生……”

那位同学好像存心挑战，开头发问，周先生连忙吐出一口烟子，从中答复：

“沫若他在日本住了这几年，对于中国的情形当然不免有些模糊了，他想不到事情会变得这么快，就连我这样一个老头子也变了。”

背着幽暗的灯光，我仿佛看见老头子瘦削的面容上那一丝丝的皱纹里潜藏着慈和的微笑，浓郁的胡须里一股股的轻烟冒出来。

“周先生现在还参加什么团体吗？”我不知道怎么一下就脱口而出，

突然感到这样问太冒昧。想不到周先生却毫无顾忌，抬起头来把我望着，傲然地很爽快地答复：

“在左联。”

我立刻在皮包里取出自己的一本戏剧集《革命的前夜》送了过去：

“最近，北平的左联在他们的刊物上大骂我这本东西，说是在同熊佛西梅兰芳他们争风，说是他们已经在群众中失掉了欺骗作用，我现在要企图来取而代之，骂我是什么什么新走狗。总之，简直把我当了他们惟一的死对头；同时，又遭到了当局的禁止……”

周先生翻开那本书，笑起来了：

“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不过，情形想得到是这样的，在上海也是一样。但，现在都有了改变，觉得动辄就显出一副凶恶的面孔，那是没有好处的；有些人，虽是不免有些错误，只要有好的倾向，我们就应该善意地批评，加强领导，最坏的是动辄就打击。”

“他们没有想到批评的任务，也没有想到领导，”我不免生起气来了，“他们预先就定下了一个固定的模型，作品放进去，完全合，就好，不合，就打击。他们的本意也不在批评，是在挑剔别人的缺点来显示自己的前进、正确！”

“周先生对于第三种人的主张觉得怎样？”那位同学好像不耐烦听我发牢骚，把问题岔开了。

“第三种人，”周先生毫不思索，顺口答复，“其实，根本就不会有这样一种人的存在，只有暂时在当中徘徊不定的。现在苏汶来替他们要自由，这自由到底向谁要去？他认为作家的搁笔，就因为受了政治的干涉，他以为文学就好像一面镜子，它应该照样地反映社会，不该因了政治作用而加以渲染。他就不知道，每一个人的这一面镜子早就涂上了自己的颜色，而社会上的事情又每在表面看起来是白而里面却是黑的，并且还在不断地变化中，好像万花筒一样；假如我们只靠肉眼去观察，结果总是错误。我们的眼睛望着太阳早晨从东方起来，到西方落下，就说太阳包着地球在转，我们看着的太阳和月亮一般大，就说它们真是一般大，就说这才是真实，这当然是可笑的错误。像这些肉眼看起来会弄得莫名其妙的情形，必须要有一个更锐利的眼去观察，这就是‘认识’，但认识清楚了，又有了‘作用’，又不免要受政治的干涉，这在苏汶又感

到不自由了！”

大意是这样，我现在只能依靠我的记忆写下来，也许还有遗漏。记得周先生一提起这问题，好像大河决了口，那些理论滔滔不绝地吐出来；他越说越起劲，手里的纸烟燃过了又接上一支

老头子那样天真的直率的态度，那样兴奋的热烈的感情，使我们不再有什么顾忌，不断地涌出许多问题，好像要把几年来在讲堂上无法了解的大道理都一齐在这儿来要求解答。我们实在太贪心，只顾求得满足自己的知识欲，没有想到老头子那样衰弱的身体；然而，他的精神却比我们亢奋，比我们还年轻，我们提出许多文坛上的人物来发问，他毫不隐讳地答复出来。无论是夸奖或是骂，他的语气是没有什么一点儿弯环倒拐的。我们也曾经同不少的所谓“名流学者”们会谈过，假如你向他们问起某人来，即使是要骂，总是那样吞吞吐吐地，语气大概是：“他还怎么怎么……不过……”在鲁迅先生的口中是绝对听不到这类的用语的。这是他的特性之一，有这种特性当然不容于一般的正人君子们。

我们的问题是那样地没有系统，心头触着什么就向他提出来。我们从“关门主义”谈到“第三种人”，一会儿又扯到“文艺批评”，“创作方法”等等。

“周先生这几年怎么不写小说了？”谈到作家的经验，我的问题又破口而出。

“理由很简单：写不出来了。”他一笑，但语气却很慎重，“因为旧有的是过去了，新的又抓不着。”

我们的谈话接着又在这问题上发挥。我认为，与其在那儿按照固定的公式，只凭一些空想要写前进的伟大的东西，到莫如切实一点在个人的身边找题材，假如一定要嫌不“伟大”，就应该先改变自己的生活，去实际经验。

从此，我们的谈话又转到了一般的文艺刊物，我把许久以来堆积在心头的计划说出来。我说：过去的刊物，差不多一出来就被军警整个地搜去，仿佛专为了给军警焚毁才出版的。这样，再怎样激烈怎样正确也是白费气力。现在，为了要想给一般读者更多的他们想要的东西，似乎应该除了“正确”还要注意到它的影响，尤其是文艺这东西，它不像一篇宣言，也不必一定要抓着什么大题目，为了影响的深入，应该在技术上